

## 一、研究緣起

台灣早期主要外銷之農產品為茶、糖、樟腦等。這些產品銷往國外賺取外匯，對當時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具重大意義。近年來隨著社會工業化腳步快速，國際間之產業競爭，茶工高齡化以及茶區沒落等影響，原有之茶業盛世逐漸受到衝擊。許多原本沒落的茶區更受到中國、越南低價茶葉的競爭，而遭到被市場淘汰的命運。

面臨低價茶競爭的台灣茶農不斷的尋求新的競爭策略與發展新的產品，提高茶葉品質，生產高價茶葉，外銷至日本、中國、加拿大等國際市場。如圖一所示，2001年至2010年台灣茶葉出口量與出口產值有逐步增加趨勢，台灣茶農將競爭變成推力以免被市場淘汰。透過農會、在地文化、茶農創新等機制創造出代表自我，有品牌的特色茶。近年來台灣的茶產業呈現出一股生氣蓬勃的氣勢，創造出多元的商品，而台灣茶也重新站上國內、外的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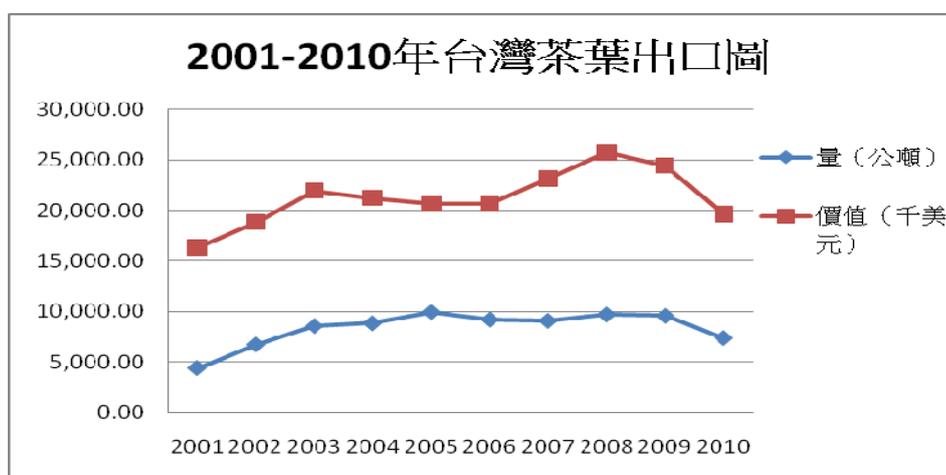


圖 1、2001-2010 台灣茶葉出口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資料查詢農業貿易統計

<http://agrapp.coa.gov.tw/TS2/TS2Jsp/Index.j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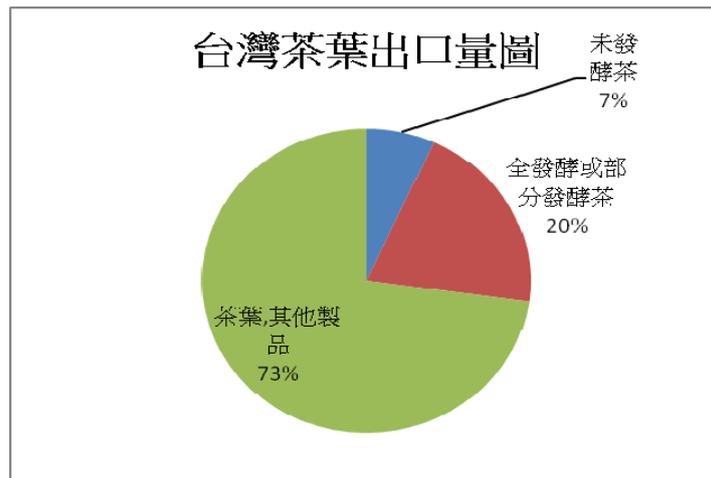
本人過去的研究主題以客家產業中的膨風茶產業為主(譚鴻仁，2007)、(譚鴻仁，2009)，主要的研究區在桃園縣的龍潭鄉與新竹縣之北埔鄉與峨眉鄉。膨風茶每台斤賣價可達三萬六千元，為台灣單價最高的茶葉之一。膨風茶屬於重發酵的茶葉，<sup>1</sup>這類的部分發酵茶占台灣出口茶葉第二大宗（圖二）。栽種膨風茶的茶農與產地的土地、氣候關係密切，膨風茶需要小綠葉蟬叮咬才能釋放出特殊香氣，無法施放農藥，所以膨風茶亦有生態、無毒等代名詞的稱呼，與現代人講求養生概念不謀而合。

現今膨風茶主要產區位於新竹縣之北埔鄉、峨眉鄉以及桃園縣之龍潭鄉，這三個鄉皆為客家人聚居的區域。膨風茶的生產網絡是一個藉由客家語言、客家文化互相結合，形成一個結合族群、文化與產業的區域。然而就地理的角度來看，過去北部丘陵的客家聚落茶葉生產區可以由桃園龍潭一直連貫至苗栗一帶，約莫是現今北部區域台三線公路沿線一帶。這個茶葉生產帶現在也都先後的生產膨風茶，形成一個特有的客家膨風茶區。這個膨風茶的生產區目前僅芎林、關西一帶不生產膨風茶。芎林地勢較平坦、靠近水源、適合生產水稻，但關西為新竹最大茶葉生產鄉，關西形成這個膨風茶葉產區中最明顯的不連續點，值得近一步的探討。

台灣早期的茶葉產區主要分佈在台灣北部區域，以台北、桃園、新竹、苗栗等丘陵地為主。在過去的膨風茶研究中(譚鴻仁，2009)，多位茶農提到早期交通不變時，新竹縣的北埔與峨眉茶農，以人力挑擔的方式將毛茶經芎林、關西挑至龍潭、大溪，再經水路運至大稻埕販售(圖三)。關西位於這條茶葉生產帶與茶路中心，關西的地型、土壤、氣候亦適合茶樹生長，一直是新竹的主要茶葉產區，有其發展的優勢與歷史。然而在過去的相關文獻上，關西的茶產業不僅在媒體的能見度、地方品牌的知名度、以及學術上受關心的程度上，都未受到適當的重視。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對關西這個新竹最大之茶葉生產區，進行學術研究，探討關西茶葉生產之特色、歷史與發展，以及它為何在優良的生產條件下，未能生產高單價的膨風茶。

---

<sup>1</sup>膨風茶有別於台灣盛行的高山茶，為重發酵茶，發酵程度約為 60~80%，僅次於紅茶的 80%。膨風茶又名白毫烏龍，成品以葉尖帶有白毫，越多則越高級。



**圖 2、台灣茶葉出口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資料查詢農業貿易統計

<http://agrapp.coa.gov.tw/TS2/TS2Jsp/Index.jsp>

關西地區全鎮客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 91%，可說是典型的客家鄉鎮。關西於清光緒年間設立「金廣成」墾號開墾，與北埔設立「金廣福」墾號開墾而後有聚落的發展類似。關西鎮是一個典型的農業鄉，耕地面積有 5852.67 公頃，佔總土地面積的 46.63%，其茶葉種植面積在 2009 年約 206.4 公頃、收穫量 147,442 公斤，佔新竹縣茶園面積及收穫量的首位。早期北埔紅茶（即現今膨風茶）經由關西至龍潭、大溪，利用大料崁溪轉運到淡水河邊大稻埕，其鄉鎮關係如圖三所示。



圖 3、北埔、峨眉、關西、龍潭鄉鎮圖

資料來源：Google 軟體並自行繪製

日治時期鼓勵台灣種茶、開設茶業改良組織。關西地區地屬北部茶園、面積廣大，鄰近當時日本人於楊梅設置的茶葉改良場，具地利之便。關西地區在全盛時期，茶廠占全桃竹苗的三分之一多，關西所生產的紅茶物美價廉，茶園面積從 200 甲增加達到 4000 甲。關西地方人士成立紅茶股份有限公司，奠定關西地區以紅茶為外銷的生產地位。

關西歷經數十年的茶業榮景，到目前雖僅餘二百餘甲之茶園，但仍居新竹縣之首，然而關西目前的茶產業，較之於這一片桃、竹、苗客家丘陵聚落茶區的龍潭、北埔、峨眉與頭份等地，僅有少數茶農生產高單價的膨風茶，形成一個明顯的膨風茶地理的斷裂帶。關西目前生產的主要茶葉商品是較低單價的綠茶。相較於關西，有同樣歷史的龍潭茶區卻不斷轉型，提升及調整茶葉品質，推出膨風茶商品。龍潭鄉於 2004 年開始舉辦膨風茶節，藉此行銷龍潭特色與茶業。龍潭鄉的發展按照 Marsden (1998) 的觀點，鄉村發展可以是一個商品轉換與再生產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龍潭藉由在地商品的調整，轉型生產膨風茶，重塑地方之文化與傳統，並透過市場與國家政策，影響了鄉村的發展與結構(譚鴻仁，2007)。在相關膨

風茶研究中發現，峨眉、北埔、龍潭等地區在此一理論觀點下，皆轉變了農產品的生產機制，也轉變了地方的治理和調節機制。地方轉變商品的生產，商品也轉換地方與地方間的關係，使得鄉村的發展形成空間關係的改變與再連結。面臨時代挑戰的龍潭鄉選擇膨風茶為再出發的商品，為何生產條件類似的關西鎮卻沒有接受膨風茶？在面對關西茶園面積逐年下降、茶廠關閉，而其他客家區域卻有原料不足，產品供不應求的同時，關西的茶產業發展策略是什麼？為何膨風茶的學習會越過關西而到龍潭，其中關西鎮是否有內隱的文化、隱微知識的傳遞劣勢？

近年來關西鎮不再以茶葉為主要發展項目，轉而以較低價之仙草為發展主軸。關西於 2010 年大力舉辦仙草節，為人熟知的關西紅茶在此商品的轉換過程中為何不再具影響力？商品的轉換需要靠農民特質、文化累積、及經驗分享。是否關西的茶農組織以及地方茶產業以不足影響地方發展？在重新轉化商品的過程中，何種力量與特質可以重新組織與重塑地方特色？

本研究希望探究現有關西的農業生產體系，瞭解關西鎮在茶葉生產、市場機制等傳統上如何產生分工與調節作用？生產部門如何與消費連結？傳統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的學習、生產、行銷，與網絡連結如何形成客家庄的成長經驗，如何形塑地方發展？全球經濟轉型過程中，關西鎮如何轉變其過去出口導向的生產方式面對國內、外的市場變化？此外，本研究希望能夠結合過去的龍潭與北埔、峨眉研究經驗，將關西的茶業發展經驗與之比較，完整提出新竹縣地區茶產業的發展歷程，藉此比較台灣鄉村發展的歷程，不同鄉鎮間的鄉村發展如何透過產業轉型再結構地方發展，以建立另一觀看農村發展的新趨向。最後，利用生產鏈的整合分析觀點，本研究期望能重新看待現今客家產業的生產空間與消費空間的連結過程，提出有別過去「原鄉遺緒」類的客家產業刻板印象，重新提出一個新的屬於客家的產業觀點。

## 二、研究目的

過去客家族群給人勤奮簡勉的精神象徵，且多數開墾較難經營的丘陵山坡地，種植果樹、茶葉等作物。近幾年在農業科技與政治經濟學觀點的帶動下，客家精神已經逐漸脫離移民思維的認識框架。本研究希望研究當代客家產業，在遷徙、發音、與宗教議題外，探究族群產業間的空間連結，以及產業內部結構藉由族群文化所形成的隱微知識傳遞、文化傳遞。關西茶葉沒落後的轉型以及商品調適，是如何選擇以及傳遞？如何應用地方資源與地方發展做結合？而轉型又是奠基在何種傳統與文化基礎之上？

本研究希望繼續對現代的客家農村與產業，進行基礎調查與實證研究，並以此回應西方的鄉村與產業理論。客家聚落如何塑造在地特色與農產品的生產？根據上述研究背景的整理，本研究的具體研究目的有：

1. 整理關西鎮茶葉發展經歷與過程，並探討主要的茶商，例如台灣紅茶股份有限公司，對關西茶業及地方發展的影響。
2. 探討為何關西鎮不像龍潭鄉，以紅茶為基礎再發展茶產業與膨風茶？而是以仙草為農業發展重心。產業轉型與客家文化有何關係？這樣社會的轉型是如何發生的？而客家文化是否有連帶轉型的現象？
3. 比較研究北埔、峨眉、龍潭等客家茶產業後，本研究希望探討何以關西鎮成為膨風茶生產帶上的不連續區域？膨風茶的技術創新與傳播、銷售過程如何產生地理擴散？膨風茶產業如何影響關西的生產與行銷過程？
4. 提供本土經驗與西方理論交互檢驗的機會，以 Marsden 之鄉村發展理論、生產鏈以及傳統理論(convention theory)，檢視關西鎮在商品轉型與關係空間的相互關係。

### 三、相關文獻之回顧

本研究探討關西茶產業的轉型與發展首先回顧鄉村發展的相關理論。首先 Marsden 的鄉村變遷觀點認為鄉農村發展中除了農產品的改變之外，人類對鄉村的主要需求亦經歷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鄉村地區提供這些功能予都市或其他的地方，形成產業連結關係。相鄰或不相鄰的兩個地方便形成了共生與互動的區域，這種地方間形成連結的概念，挑戰傳統地理學的區域觀點，由地理鄰近性 (geographical proximity) 到關係鄰近性 (relational proximity)；其次，本研究回顧調節理論，補充前述鄉村發展理論；在討論茶葉商品化與商品生產轉型與客家文化方面，本研究以商品鍊與傳統理論作為本研究之分析架構。最後，討論 Marsden 的理論，並輔以鄉村性的概念提出鄉村轉型的另一種可能性。

#### (一) 鄉村發展的類型與分析

鄉村地區的發展在關係網絡的概念下，可能會形成不同的發展類形，而造成地方的不均等發展，Marsden(1998)因此提出四種鄉村發展的理念型 (ideal types)，Marsden(1998:17-19)的四種類型如下：

1. 保存的鄉村(preserved countryside)
2. 競爭的鄉村(contested countryside)
3. 世襲的領地(paternalistic countryside)
4. 依附的鄉村(clientelist countryside)

Marsden(1998)指出英國的鄉村在後生產的時代，轉化成上述四種發展模式包含了三項重要的觀點：1.鄉村的不均等發展的類型背後，包含著市場、利益與網絡關係 (地方與地方) 的重新組合，2.不同的鄉村發展模式，代表不同的資源組合與配置，同時也包含不同的商品化過程，3.不同的經濟關係的重組是鑲嵌在不同地方的社會、政治等條件之下。因此這四種的發展類型背後即是不同的地方制度、商品化與網絡關係的重組，而形成再區域化重組地方間的關係網絡。在這區域化的概念之下，區域化不再是一個地理鄰近性的概念，由國家經過區域再到地方進

行控制與分工的過程。區域化的討論應由調節 (deregulation and regulation) 、商品化 (Arenas of commoditization) 與網絡與行動者空間 (Networks and actor spaces) 三方面進行討論(Marsden, 1998)。

## 1. 調節

當地方再區域化或分化時，鄉村的地方治理開始轉變，國家的介入，法律或政策對地方的影響開始影響私部門，而有去調節與再調節的發生。國家可能藉由政策去解除對鄉村土地的使用管制與糧食生產，或其他農產品生產的管制。全球化後的農產品自由貿易與流通，不論國家任何的保護政策，都使得鄉村地區的土地使用與生產形成新的調節或治理。這種鄉村調節與地方治理的變化對鄉村地區的影響使得鄉村發展分化至四個主要方向：(1)大宗糧食生產，(2)高品質食品生產，(3)農業相關的發展，與(4)鄉村非農業的發展再結構(Little, 2001)。這種轉向導致出鄉村的新權力關係 (power geometries) (Little, 2001: 98)。因此鄉村再結構的過程中包含國家或地方規劃的轉變，形成新的調節過程。國家在調節過程中的角色，由過去強勢的角色退卻至輔助的資源提供者，或是地方治理中的協調者或管理人的角色。國家的資源減少使得它提供的資源不再能夠影響市場的方向，它僅能提供地方的基礎設施，或是做為一個信任的基礎，協調、動員地方治理。在英國的例子中，如英格蘭的西部，國家的權力減少，但農民上並未因此增加他們的影響力，反而是中產階級或非農業的部門影響鄉村發展的方向，而形成了保存鄉村或競爭的鄉村。後生產的鄉村也就成爲一個充滿競爭的場域 (a contested social milieu)(Marsden, 1998: 23)。瞭解鄉村發展必需要瞭解鄉村發展的新調節機制與它背後的治理關係。鄉村的調節是由不同的部門共同參與而形成的，不同的鄉村發展，背後都代表不同的部門的治理。Marsden(1998)的調節概念並未忽視地方的差異，否則即不能解釋鄉村發展的差異而形成前述四種發展的理念型。Marsden 認爲地方必須形成自己的調節與制度架構，處理地方發展的優勢與劣勢。因此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中指出地方應有因地制宜的調節差異，由調節所涉及的行動者，互動關係與治理機制去認識地方發展的差異。

## 2. 商品化

Marsden(ibid.)認為商品化不僅是討論鄉村的生產，而且也包括生產農業或非農業產品對地方所產生的社會與政治影響。在後生產的鄉村發展模式下，不論生產大宗糧食或是強調地方特色的高品質食品，或甚至是公共空間等商品，鄉村地區都必須轉型以配合商品化的過程。鄉村發展商品化的過程中有兩項重點值得我們思考：(1)商品生產與其相關的價值如何改變鄉村地區的社會實踐？(2)在鄉村生產該項商品時，生產-消費關係重新組合時，商品生產所需的生產關係與價值觀是如何被介紹到地方？地方係接受或反抗？商品化的過程不僅討論鄉村轉型的過程中由原有的生產（例如糧食作物）到其他的生產（如良好的環境或高品質的食品）有哪些必要的自然或社會要素？同時商品化的過程也關心原有的鄉村是否發生社會、政治的反抗？那些原來在生產系統內，但之後被排除在外的社會要素有哪些反抗？ Marsden(ibid.)認為商品化的過程關注轉型區內的社會抗拒的工具與策略，鄉村發展的轉型與發生是地方再商品化與地方抗拒的平衡。鄉村在商品化的過程，會造成地景的轉變，除外它也造成了多地方的轉變，例如價值觀、土地所有權與財產關係或地方社會組織等(Marsden, 1998)。因此，鄉村轉型中可以巨觀地觀察鄉村地區如何重新生產商品，及微觀地方如何轉變抵抗與調和以配合此種轉變。

商品化會造成物的價值的改變。Appadurai（1986）指出物的價值是在經濟交換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他也採用 Simmel（1987）的觀點，認為物的價值並不是一個本質上的存在，物的價值是人所賦與的。為說明物的價值的變動，Appadurai（2006：15）舉例說：「昨日的商品可以是明日的藝術品，今日的藝術品也可能是明日的垃圾。」 Appadurai（ibid.）認為物的價值是人所賦予的，而其價值則體現在每一次的交易中。在不同的物的交換與使用中形成物的社會生命史。在 Appadurai 所編著的「The Society Life of Things」一書中，Appadurai（1986）探討物的價值與它每次的使用與交易中，物如何與社會與文化互動，而一再的改變價值。他認為物無本質，惟經過不斷地創造與意義賦予，而形成物的社會生命史。

Appadurai (1986) 的觀點提供了一個長時間對物的觀察角度，了解物的社會生命史。這種觀點透過長期貼近的觀察，理解物被稱生產消費等意義賦加的交換過程，可以與 Gereffi (1994) 提到的商品鍊或 Ponte (2009) 所稱的價值鍊互相比較與對話。如果不比較人類學者與經濟地理學者學科背景的差異，我們可以簡單地說，Appadurai 強調是交易關係是如何發生，它的意義與社會脈絡是甚麼？而 Gereffi 與 Ponte 則著重在理解生產上的分工與協同治理過程如何在現代的社會中，生產出一個有市場價值的商品。

### 3. 網絡與行動者空間

鄉村發展轉型的第三個要素是鄉村發展形成商品化，同時鄉村地區與其他的地區形成網絡的關係。不同的地方因為地方轉型而形成網絡關係時，鄉村發展可能對不同地方形成不同的作用，此一觀點超越傳統外生與內生發展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的二元觀點(Murdoch and Marsden, 1995)。Marsden(1998:26)稱此為行動過程的空間化 (the spatialization of action processes)，意即不同的地方形成集體行動，集體行動乃透過知識、資源、物質、技術的共享而成。在不同地方形成協同的集體行動的過程中，個別的地方會因為種種關係的形成、網絡的連結而產生改變。網絡關係說明了第一項概念：再調節的發生，地方形成新的調節與治理關係以維持網絡空間的運作。Marsden(1998)認為鄉村再結構即是新的網絡關係與網絡空間形成。在 Marsden(1998)的論述中，義大利或是英國的例子，都是以網絡空間的概念來解釋鄉村發展與轉型。然而，這樣的觀點限制之處在於其選擇性的介紹，容易誤導人認為，成功的轉型必須要地方重新商品化，與其他的地方形成網絡空間。Marsden(ibid.)並未以適當的篇幅與案例介紹地方逐漸喪失競爭力的過程，是否也是一個轉型的過程。地方的轉型發展，如果是一個重新形成網絡空間或集體行動的空間過程，那地方的沒落是否可以是一個網絡的轉型與再結構的過程。換句話說，鄉村的轉型未必是一個正向的發展，鄉村發展的沒落也應當以一些負面的範例去充實網絡空間的形成與製作為發展轉型的應用。

鄉村的商品化形成網絡的空間並且引起鄉村內部調節與治理的變化是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的三個核心概念。在這個理論下，英國的鄉村形成了此種概念上的典型：保存的鄉村；競爭的鄉村、世襲領地與依賴的鄉村。這種類型學與發展理論是否可以應用解釋其他鄉村地區發展，值得更多的關注與需要多元的個案去補充。在理論的層面上，依然有相關的理論可以對此進行補充。

## (二) 調節理論(regulation theory)

調節理論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調節理論認為經濟關係是社會鑲嵌與社會規範的，所以理性的經濟人應該也是鑲嵌在社會傳統之上，而受到社會規範與慣習所影響。廣義的說生產與消費的習性與規範是由社會與文化所影響的。資本主義下的生產關係是一個充滿經濟、文化、社會等的均衡，而經濟關係改變時，勢必牽動原有的均衡，同時經濟關係的轉變也牽涉到這種均衡的改變。Boyer(1990)於是指出，經濟與社會動態的變化的探索是調節理論的核心命題。Jessop(1997)的意見可視為 boyer 觀點的補充，Jessop 認為調節理論關心社會中的制度、規範、傳統等的補充功能，以明瞭社會再結構與轉型的發生。調節理論由起始的法國學術界到英語世界乃至中文的環境中，都因為文字字義的限制而造成一些誤解。Goodwin(2006)就指出 Regulation 不只是「訂定準則」，與「法律準則」的意義，它應指經濟活動中的廣義的調節或準則的意涵(Goodwin, 2006: 306)。Goodwin(2006)以福特式的生產制度解釋調節理論在農業研究中的應用，他認為調節理論的觀點不只是看待科技或其他的創新如何改變農民或農場的操作，而是更廣泛地檢視農民與農場如何整合到生產與消費的迴路之中，例如新生成的市場，例如政府角色的改變，例如農民如何改變他們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的屬性。Jessop(1992)抱持這個整體觀，指出福特主義的英國農業生產牽涉的層面包含農人的集體行動的工會權力、大型企業的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離的制度、貨幣與信用制度，與福利制度等。因為調節理論主張經濟關係背後的文化與社會等面向，所以「地方」這個概念就自然的出現在其理論命題中。因此 Marsden(1998)在他的鄉村發展概念中，將調節與地方再結構關係以去調節與再調節概括之。

Marsden(1998)主張在鄉村再結構的過程中，有四項因素形成去調節與再調節的過程，分別是私部門利益的影響；糧食生產中的新農業部門興起；公部門的退縮與新調節力量的出現。所以地方的轉變是與公、私部門互動而顯現出一個去調節與再調節的過程。例如全球化導致農產品的流通與貿易，都會牽涉到公、私部門與鄉村中的非農業部門的變化。Little(2001)指出這種轉變會導致鄉村出現新的權力關係(power geometries)。國家在全球化引起的地方調節過程中使得它對市場的影響力有限，僅能夠提供地方的基礎建設或是成爲一個信任的基礎，協調與動員地方的治理過程。因此這種變化中，鄉村就形成一個充滿競爭的場域(a contested social milieu)(Marsden, 1998)。Marsden(1998)以調節的觀點理解鄉村的發展，不同的鄉村可能有不同的調節模式，形成差異化的鄉村。

### (三) 傳統理論(convention theory)

調節理論主張，地方的發展與轉型事實上牽涉到地方的制度、傳統、規範…如何與經濟發展與經濟關係配合，再形成一個平衡。Marsden 認爲地方形成新的調節與治理時，地方並不是均質，也並未消失，所以地方才必須轉變以配合發展與轉型。但隨之而起的疑問是，地方的什麼因素或社會條件影響網絡與地方的鑲嵌過程？Murdoch et al., (2000) 指出網絡空間形成的過程中，地方並不是沒有反抗，網絡空間的形成是一個不斷地去鑲嵌與再鑲嵌的過程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dis-embedding and re-embedding)，傳統理論在這方面可以適切地回應如何鑲嵌的問題。

在地方與地方形成的集體行動的網絡中，地方內有一套屬於這個地方特有的約定俗成的規範，Storper and Salais (1997) 形容爲「傳統就像由相互瞭解與達成共同目的的人們所形成對事物運作的『假設』。當互動不斷地在類似情況下被重覆以及某些行動持續地有效，這些傳統就成爲習慣，而我們則不再注意到這些假設要件。」。Storper and Salais (1997) 認爲傳統理論成立的前提是任何社會、經濟、政治行動可以在不同參與者之間得以協同進行，他們對這些行動有共識，而這些共

識乃源於行動者對結構或社會脈絡有相同的認知。因此，在 Storper and Salais 的概念下，地方的行動者對在地的社會、政治或文化背景或結構有一致的認知，而這些共同的認知決定他們對事物的瞭解與期待，也因此行動者被整合於此習慣之中 (incorporated in routines) (Storper and Salais, 1997)。Storper (1997) 認為地方傳統包含習以為常的默識知識 (tacit knowledge)，它是長久形成的地方知識，引導行動者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做出最安全的選擇。地方的傳統規範影響人們的行動，在此規範下人們形成一策略性的行動，人們可以依據地方傳統去判斷自己行動的投入與產出，並且藉此期待其他行動者預期行爲。因此 Murdoch et al., (2003) 主張傳統造成社會實體上的結構化行動 (an arena of structured action)。

在地方去調節與再調節達成發展與轉型時，傳統理論可以處理鑲嵌的問題。Marsden 的鄉村發展的理論擴充到不同的地方與空間結合，形成集體行動時，它比較著重在地方內部如何轉化 (形成新商品生產，形成新的調節與治理) 然而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卻未能處理不同的地方或空間為何可以形成連結？它們在形成連結時如何在政治、社會或文化等面向上互動配合。Murdoch and Miele (1999) 認為傳統理論可以解釋網絡上不同的組織如何整合其不同的行爲規範而形成地方上的一致性的習慣。在形成地方間或網絡間具一致性的傳統時，有兩種理論上的可能：其一是某方的傳統凌駕包容一方的傳統，比如說它們之間有著文化或社會的一致性；另一種可能是透過行動者網絡理論所稱的轉譯 (translation) 而發生，此時不同的地方仍舊保有其固有的傳統。

傳統理論反對經濟人 (homo economics) 的理性選擇假說，Lewis et al., (2002) 認為個人在社會中參與集體行動的原則不是「利益極大化」而是尊從社會的制度。特別是當人遇上不確定性時，人會傾向順服既有的傳統。人不可能自外於社會，做出利益極大化的選擇，這不會是他的理性選擇。相反的，人會循著社會既有的規範與傳統，再做出利益極大化的選擇。當商品化發生、空間形成連接時，地方是否接受創新，決定於創新的商品與技術是否能與地方原有的傳統結合。Thevenot et al. (2000，引於 Murdoch et al., 2003) 歸納出 7 種的傳統類別：市場價值，效率，

公德，地方價值觀，創意，知名度及環境價值做為鑲嵌之所以發生的原因。這七種傳統代表著行為規範、準則的不同類型，而這七種傳統分別提供七種類型的相關行為或評價去處理人們的日常生活依據。Raikes et al. (2000, 引自 Lewis et al., 2002) 也提出四種影響鑲嵌的傳統：市場、人際、企業、公民傳統。市場傳統指物品價值是否符合其價格，而以價格影響人的行為；人際傳統指人際之相互協調以達成集體行動信任是決定協調與否之依據；在企業運作的場域中，事物循標準程序運作，其行動以固定的準則規範行為；最後，公民的領域內，公民依其對集體的了解與一般原則行動，而依照公共利益與國家的力量運作。此外也有其他的學者認為影響社會行動的傳統有品質、生態與國家制度等 (Lewis et al., 2002)。Murdoch et al., (2003) 解釋這些傳統可視為行動的戲目，提供行動者行動的依據，同時也成為行動者聯結的一套關係。在空間網絡形成時，這些傳統會成為一種具有位階關係的關係網絡，而達成網絡上行動的依據。當不同的地方、組織達成集體行動時，地方與行動者不僅根據商品化的需求形成關係網絡，並且它們之間的傳統也結合成一套「行動環境」(environment of action)(Murdoch et al., 2003)，不同的環境會因為傳統的階層而形成不同的行為規範，引導行動者的作為。傳統理論解釋地方間或網絡間形成連結時的作用，它解釋社會或地方如何的微調行動者在跨地方或跨網絡行動時改變行動或價值，以順利的接和兩個差異的地方或網絡。傳統理論視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行動環境，而這些行動環境是地方上不同的傳統所組成，因此當兩個地方形成關係空間或網絡空間時，除了彼此間的調節或治理過程必須協同之外，地方的傳統也會產生互動而影響地方間形成網絡空間的可能。例如兩個農業產地形成關係網絡時，不同的傳統若對於產品的製程的效率傳統或是品質傳統有不同的行動環境，那協同過程中的遠地行動 (action at a distance) 就很可能不會發生，而必須再形成妥協或放棄。

#### (四) 品質治理(quality governance)

Freidberg(2003)指出品質有兩大類型：制度上的品質與交易上的品質，前者為標示或品牌，而後者為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信任或規範。Freidberg(2003)認為前者包含於工業化的傳統(industrial convention)，包含標準化的產品及使用程序，以及異地消費與成熟的交通設施等等；而後者則形成家戶間的生產-消費傳統(domestic convention)，通常是人際的信任與產地消費以及非大量生產、非標準化等特色。工業化的傳統較諸家戶的傳統未必是進步的，而不過是調節概念中的均衡的連帶關係。例如在東勢梨這種高價與具有地方特色的農產品中，產地消費可以創造真實性與臨場感，同時具有防偽、教育、品質比較與塑造的功能。Murdoch(2000)補充品質概念另外的面向，他認為除了制度品質(Murdoch 稱之為品牌品質(brand quality))，也包含有生態品質(ecological quality)與消費者感知的品質(consumer-perceived quality)。

此外 Henson (2000) 也指出區分產品品質的面向有三種：產品本身的品質，生產過程的品質與使用者（例如消費者對品牌的主觀評價）方面的品質。這三個面向包含福特主義標準化生產的大宗產品或是非福特主義方式生產的少量地方產品。就農作物生產而言，Henson 的觀點主要在由商品鏈概念下由生產至消費的分工觀點，但農作物的品質通常會指涉到農作物與地方的關係，因此 Parrott et al. (2002) 認為 Henson 的觀點沒有與地方的概念結合。消費者在消費與欣賞農產品的品質時，品質與產地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Murdoch 強調在英國發生狂牛病之後，消費者對產地的地方性與生態的敏感度增加，因此在分析食品的生產過程中應該更注意農業地區的社會－自然條件 (social-natural conditions)，這是農產品有別於其他商品的最主要特色。福特式的大量標準化生產使農產品在外型、品質上達到一致的標準，看來大小、口味一致。但基本上農產品的生產是有地方性的，地區生長條件的差異，使得同一農產品形成明顯的地方差異。現代農業生產中的侵奪與取代使得傳統農產品在市場中消失，而伴隨著傳統農產品的消失，地方的社會－

自然關係也消失了。所以全球化下的標準化大量生產方式，使得侵奪與取代的過程在取代地方產品之後也取代了地方。Parrott et al. (2002) 因此稱這種景象為 placeless foodscape。

農產品品質的治理過程通常較多在討論真實性與地方連結的問題(Neilson, 2007)。除此之外，等級的判定也是品質治理中重要的一環。Neilson(2007)指出國際咖啡的供應商建構等級與地理認同的目的在於維持他們的利益，而這種品質、等級是社會建構的，反映出供應商的 political 與經濟利益。同樣的 Renard(2005)也指出品質不是商品的內涵條件，它必須被建構與行銷以達成集體競爭的優勢。而這也驗證論述影響認識的觀點，例如台灣近年流行的普洱茶原本的臭曝味經由不同的論述建構，而成爲可接受的陳味。分級與標準也因此成爲私部門常用的手段去增加產品差異化與競爭力的工具(Neilson, 2007)。

Foucault 認爲治理並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行動，而是包含某些意圖的行動。採用治理性的概念理解品質治理的過程，可以更真實的理解治理網絡上行動者的行動與意圖。例如農產品地區治理的意圖就有風味的意圖，產地真實性的意圖，與健康的意圖等。按照 Foucault 的解釋，government 的定義是一個非常寬鬆的概念，「它適用於任何理性、衡量的工作…目的在改變行動。…根據某些規範與目的來改變我們的行爲」(Murdoch, 2004: 41)。在 Foucault 一個處理權力與規訓 (disciplinary) 的概念下，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包含了治理 (governing) 與心態意圖 (modes of thought)。Foucault 的治理性闡釋了權力的行使是一個二元連動的概念。治理不可以被視作一個單獨與靜態的分析對象，治理的背後含有政府與其他參與者的規範性企圖。治理在面對不同的治理網絡連結時，原有的治理企圖會受到挑戰與妥協而達成一個新的規範性企圖，所以任何的治理模式都應被視爲是暫時性的，同時治理也應該被視爲一個動態的發展模式。治理與空間的關係會造成後結構地理學者主張的流動的空間(Fluid space)，其意涵爲：空間關係是一個恆常的發展與轉變的關係，而此後結構地理學者也提出一個多元的空間性的概念，反對空間爲結構限制，而應超越傳統空間或區域關係。空間的變動、轉變是由規範

的空間 (space of prescription) 到協調的空間 (space of negotiation)。Foucault 提出治理的過程不是一個循環論證 (治理改變空間再改變治理)，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在治理的過程中，治理何以能發揮作用去改變空間？是因為治理扮演的角色提供一個行爲的行爲 (conduct of conduct) 的作用。所謂「行爲的行爲」的概念是治理行爲受到一定的意圖所影響，而使得形塑品質的行爲本身是具有意圖性的，同時它也具有一定的操作模式。

在品質治理的討論中，治理的發生是一個網絡的概念，研究的課題可以是討論如何改變參與者的網絡以及利用各種行爲去改變治理網絡以及整合治理網絡上的權力與資源的分配，以提高效能。

## (五) 商品鏈

商品鏈的概念指的是物質或非物質的投入到商品或服務的生產轉換過程。這個轉變的過程包含了生產、行銷、運輸與服務等主要活動與技術投入。此外商品鏈也包含財務、人力資源或整個過程中的基礎設施提供等輔助活動(Coe et al.,2007)。商品鏈的概念除了對生產投入與產出的結構(input-output structure)做解釋外，它對地理上空間與地方概念的應用，也使得他被更廣泛地應用。商品鏈另外包含了三個概念：領域性(territoriality)、治理(governance)與制度架構(institutional frameworks)(Gereffi, 1994)。

商品鏈的投入產出過程是一個生產的過程，然而當這些生產分工與消費發生在不同的地方時，它的地理意義則是商品鏈在連結生產與消費的同時，也連結了地方，造成地方的分工連結。Gereffi(1994)提出的全球生產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概念，充分地說明生產鏈如何地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連結不同的地方，而形成一個因生產鏈而出現的跨界治理，並且影響到不同的地方特性。販售在地的農產品成爲 Winter(2003)所謂的防衛的地方主義(defensive localism)。Coe et al.(2007)指出全球商品鏈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網絡時，交通運輸科技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使得地方快速的變化。地方面對激烈的地方間競爭會產生快速的變化，而配合這

些改變的部門也不只是生產部門而已，可能包含了其他文化與政治等部份。這一點引起了許多經濟社會學者提出了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的概念，生產鏈的形成牽涉到地方文化或是社會的連動性。

生產鏈上的各部門形成一個分工合作的整體，而其部門有治理的理性。Gereffi(1994)提出兩種治理形式的生產鏈：生產者主導與買家主導的生產鏈。在Dicken and Miramachi(1998)貿易商的研究中，貿易商是生產鏈的參與者卻又不是基礎的生產者，它提供了四項重要的功能，扮演了主要治理的角色，使生產鏈得以順利運作。這四個功能分別是貿易協調聯繫、財務協調、市場資訊整合與體系整合。Coe et al.(2007)引述 Gereffi et al.(2005)的概念，提出關係治理(relational governance)的概念。關係治理概念的出現是因為地理學者發現市場交易的過程中，治理的參與者形成一個長期合作的關係，而治理中的分工與合作會隨著長期合作關係的形成愈加鞏固，進而發展出另外的分工關係。例如 Coe et al.(2007)就發現英國的超市在與貿易商建立一個長期合作的關係後，貿易商的角色已由一個單純的貿易商，增加了加工、品管、行銷與評鑑市場等功能。

商品鏈的運作必須考慮到制度架構。制度架構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前者如貿易、稅務等政策；後者則為一般較為不見的，例如地方特色的生意法則(ways of doing business)或政治文化等等(Coe et al., 2007)。制度架構使商品鏈與地方的接合或鑲嵌有更清楚的解釋。Coe et al.(2007)認為商品鏈牽涉到不同的地方整合與協同，而每個地方都有其特定的生意法則(ways of doing business)。從傳統理論(Convention Thoery)的觀點而言，商品鏈的地方整合鑲嵌在地方特有的傳統上。最後，商品鏈並非只討論生產消費連結的生產面向，消費面向中的道德或其他文化訴求也會影響到商品鏈的治理，例如公平貿易(fair trade)的概念影響咖啡的生產鏈價值分配。其他在農產品生產鏈中的例子有反對對基因改造食物，或動物保護的訴求也都會影響生產鏈的運作，與生產鏈所形成的關係空間。

## （六）鄉村性

在鄉村研究中，最根本也基礎的發問，便是什麼是鄉村？該如何定義鄉村？不同的研究取徑，有著不同的思考脈絡，對於鄉村的定義也就有所不同。換言之，對於鄉村本體論的認知不同，導向了不同的研究發問及對於鄉村的整個關照。以 Panelli(2006)所整理的西方鄉村研究取徑而言，台灣的學術研究只有在邏輯實證論以及晚近の後現代、後結構主義，這兩種研究取徑中有學術生產的結晶。

在上述文獻回顧中提及的 Marsden (1998)的調節、商品化與網絡與行動者空間三方面進行討論，強調經濟為主要動力，繼而影響社會、文化層次的理論框架，可被視為政治經濟學的取徑。回顧政治經濟學取向的鄉村研究，大致可包括四個方向：首先，農業經營視作是資本家的生產，農業經營在於追求最大利潤。其次，探討階級問題，包括新移民、中產階級與地方人士間的衝突與壓迫、以及縉紳化的問題。第三，鄉村經濟的改變，尤其是因為低成本的緣故，製造部門由都市轉移到鄉村；以及鄉村景觀如何被包裝成觀光銷售的商品。最後，檢視國家的角色，國家並非是中立的，而是為創造有利於資本家的條件（Buttel and Newby, 1980;引自 Woods, 2005）。

政治經濟學的取徑過於趨向唯物論的思維，過度地以經濟、物質為作為地方轉型的唯一解答，這樣的分析取向忽略了社會生活中的非物質世界（梁炳琨，2007）；另外，對於鄉村空間的形塑的關注也不足。換言之，在地方轉型的過程中文化所扮演角色也相當吃重，如關西在發展觀光茶廠時，茶廠本身的半磚造半木造的工廠，以及豐富的文物歷史，吸引觀光客駐足參觀。

在文化轉向的鄉村研究中，對於「鄉村性」(rurality)的研究，是對於自然與社會關係的重新省思。近來西方學者已不再去嘗試劃分出精確的農業邊界，反而是去理解人們所認同與生活的鄉村性，鄉村性的論述成為理解城鄉差距的重要方式（Woods, 2005）。換言之，文化研究取向，一方面關心鄉村是以意義的概念所建構，這意義是經由各種社群、不同方式的論述性所築構的；另一方面，則是關

注於當代鄉村的多元的社會體驗，透過他者的觀念，理解來自經濟社會和地理所邊緣化的不同權力、發聲的情境，例如受限於鄉村地區男性、中產階級立場所邊緣化的情境（Holloway and Kneafsey, 2004；引自梁炳琨，2007）。這樣的論述方式部份地建立在反都市化、反開發的論述上。這也是說，對於鄉村性的想像與論述，是都市居民對於都市生活、環境的厭惡上，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意象之上，是現代性的避難所（Short,1991；引自梁炳琨，2008）。舉例來說，關西鎮的氛圍、印象，如客家庄、仙草產地、茶葉山城等不同意象的營造與經營，吸引都市的居民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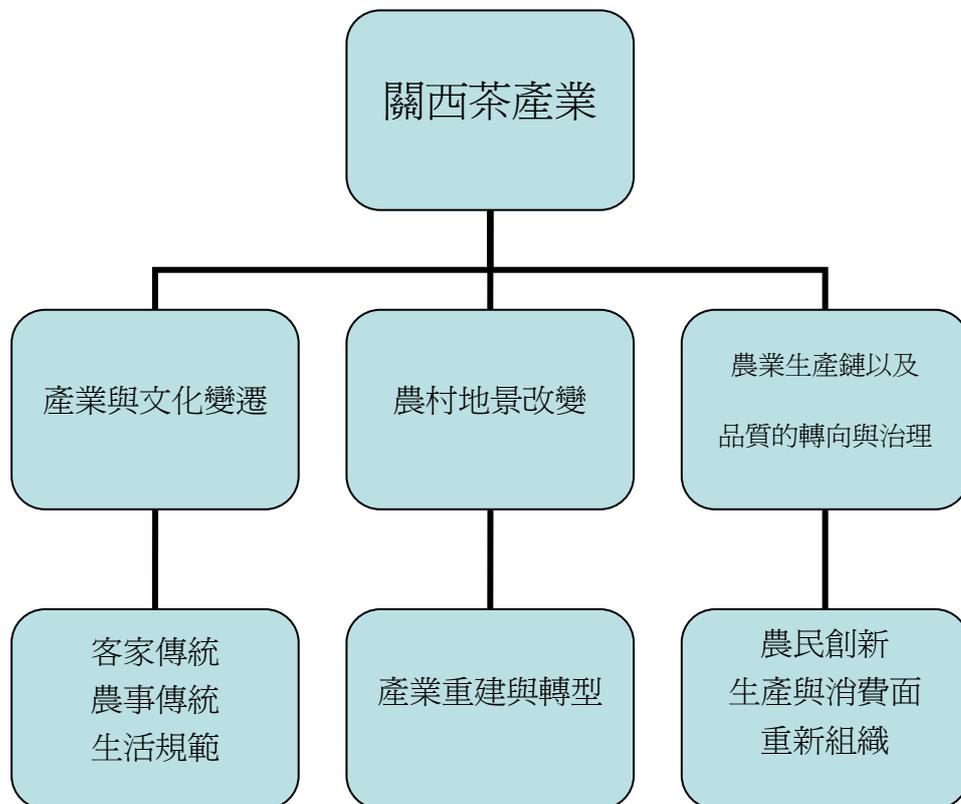
在近來的鄉村研究中，也導入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分析鄉村性完整的文化面向與不同社群的社會經驗，如 Thrift(2008)的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積極地以民族誌研究方法取代過度依賴文本論述、再現的研究方法；Woods(2010)的 Performing rurality 則是修正了 Thrift 的路線，分析每個行動者在展演鄉村性中所飾演的不同角色，行動者可包括了在地生活的居民、外地移民者以及觀光客。

##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關西地區茶產業轉型與其他鄉鎮間的茶葉分工情況，並將農產品品質治理的過程進行深入研究，對照過去累積之龍潭、北埔以及峨眉等地區的茶產業整體研究，以補足原先北埔、峨眉研究中有關膨風茶茶業之不足。主要的研究方法進行包含：深入訪談、參與觀察以及文獻分析，佐以量化數據為輔，進行研究，其安排如下：

- 1、一級資料收集的資料收集方法是以半結構的深入訪談以及參與觀察等方法，瞭解關西鎮在商品轉換以及技術的轉移，是如何與當地客家文化的轉變。訪談 10 人次，訪談對象包含：茶農、商販、居民、及意見領袖，並深入訪談地方組織的成員，探討地方人際網絡的型態與功能。
- 2、在次級資料的收集與文獻回顧方面，本研究將收集新竹縣政府與關西鎮公所的統計數據並實際訪查數據對照。在理論與文獻回顧的部份，將參考現有的論文、期刊文章等資料，以多方面的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交叉比對並輔以「滾雪球」法(snowballing)回溯至其他相關文獻。
- 3、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社會網絡、商品品質轉向與行動創新者如何影響地方傳統文化與其轉變關係。本研究以文獻回顧以及深入訪談的方式進行，針對茶農及台灣紅茶股份有限公司等茶葉業者進行訪談。

## 五、研究架構



## 六、預期目標

1. 本研究將調查與討論關西鎮特有地方產業：關西農業如何轉型與創造出新的地方特色？本研究藉由鄉村發展與傳統理論對話，以期能藉由本研究整理出「農村發展」以及「客家傳統」的經驗，並提出跨學科的討論。
2. 在政策上，本研究希望由這些概念的探討，探討傳統客家產業，在地方發展的過程中、與公、私部門合作的可能方式以供政府相關部門參考。
3. 本研究希望在研究的過程中對關西鎮的客家文化與其茶產業發展歷程做出完整的整理，預期可提出相關的個別產業發展與組織學習與創新的專文供相關部門參考。

## 七、研究範圍

新竹縣主要茶區為關西鎮、峨眉、北埔地區，關西茶園面積約 206 公頃為新竹縣最大。本境多以丘陵為主體地勢高峭，海拔高度均在 150-500 公尺以間，多為酸性透水性佳，適宜種植茶樹，在日治時期大量種植曾高達 4000 甲，主要以外銷紅茶為主製茶工廠多達 30 多家。關西有鳳山溪和數條支流，有了高山溪流及季節調節雨量充沛，因此四季溫和、排水良好，適宜種植各種茶樹、果樹、仙草成長。

由圖三可知關西位置以桃園縣龍潭鄉、新竹縣芎林、峨眉為鄰，關西鎮的產業目前仍以農業為主，耕地面積有 5852.67 公頃，佔總土地面積的 46.63%，茶園主要分佈於東平里、仁安里等地區。關西的茶葉因氣候、地形等天然條件適宜茶樹的生長，成名甚早，部分茶農所生產之綠茶、綠茶粉已取得有機認證標章。仙草主要分佈於石光里、上林里、新力里、南和里等地區，種植面積約為 150 公頃，佔全台灣仙草產量 80%以上，是最具特色的作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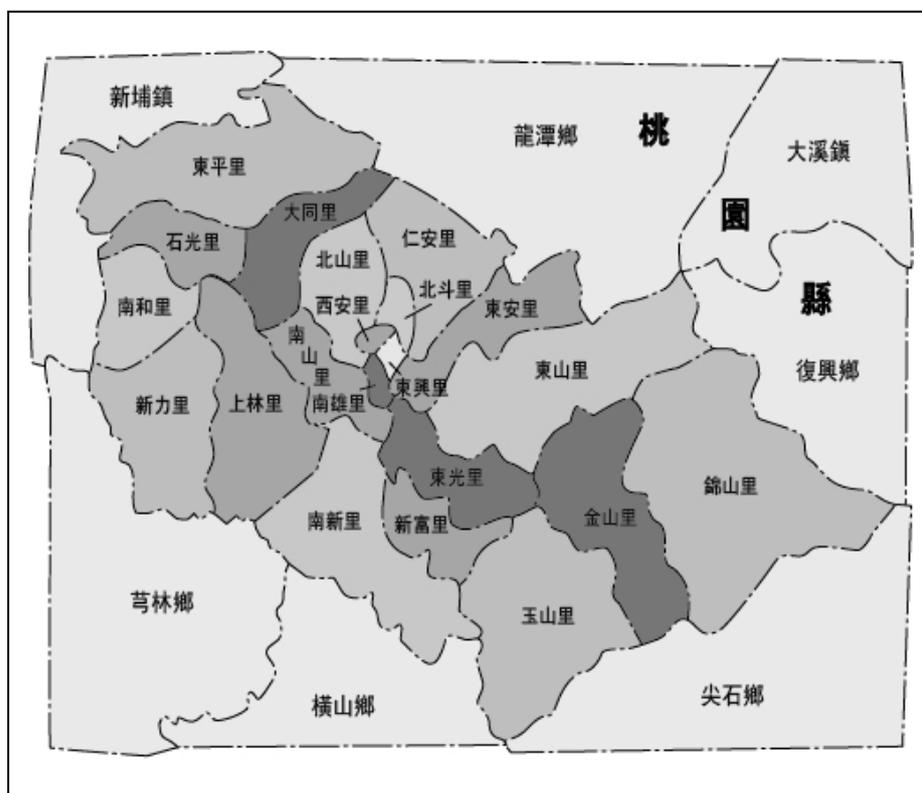


圖 4、關西鎮行政區

資料來源：關西鎮公所 [http://www.kuanhsi.gov.tw/kuanhsi\\_badge.asp?F1\\_id=006](http://www.kuanhsi.gov.tw/kuanhsi_badge.asp?F1_id=006)

## 八、關西鎮簡介

關西鎮舊稱鹹菜甕<sup>2</sup>，位於新竹縣之東北方，為牛欄河與鳳山溪匯流之處。南鄰尖石鄉、橫山鄉，西南接芎林鄉，西北為新埔鎮，北為桃園縣龍潭鄉，東臨桃園縣復興鄉，為新竹縣面積最大者的平地鄉鎮。

鹹菜甕正式開展墾移民的活動，始於清代乾隆末年連際盛奉憲示諭在本區開隘開墾，由衛阿貴率領的竹塹社平埔族衛家接續經營墾務。大致而言，鹹菜甕鄉街的所在地是由三條河川匯流而成的河谷盤地，形勢完整，拓墾的方向便是以鹹菜甕鄉街所在的河谷盤地為中心，由西向東循著鳳山溪各支流谷地進墾(李明賢，1999)。

### (一) 自然環境

關西鎮西面為帶狀平地，其餘東南北三面連峰，多為丘陵起伏之山坡地。東西長 21 公里，南北寬 14.4 公里。全鎮面積 125.5 平方公里(全鎮 21 里，297 鄰，20 個社區發展協會)，屬新竹縣平地鄉鎮中面積最大者(全縣 13 鄉、鎮、市，其中有 2 個山地鄉)。鎮內最高峰為烏嘴山，海拔 1,790 公尺<sup>3</sup>。

整體而言，本研究去地勢以東北最高，可達 500 公尺以上，漸次向西展延，在西邊最低，鳳山溪沿岸不及 120 公尺。全區四周均為台地丘陵，但在中央部份是次低的河谷盤地。整體而言，構成本區最主要的地形為台地，次為丘陵山地(李明賢，1999)。

### (二) 人口概況

關西鎮居民最高紀錄為民國 60 年底的 44,107 人，隨著人口外移，截至 100 年 2 月，本鎮面積 125.5193 平方公里，21 里，297 鄰，9,257 戶，人口數 31,736 人，人口密度 252.84 人/平方公里。男性人口數為 16,887 人、女性人口數為 14,849 人，隨著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比率逐年增長(100 年 2 月止 5,782 人)，佔 18 %，百歲

<sup>2</sup> 先民在使用本詞時，有著不同的用法，如鹽(咸)菜甕、咸菜甕(甕)等方式(李明賢，1999)。

<sup>3</sup> 新竹縣關西鎮全球資訊網 [http://www.kuanhsi.gov.tw/kuanhsi\\_badge.asp?F1\\_id=002](http://www.kuanhsi.gov.tw/kuanhsi_badge.asp?F1_id=002) 參閱日期：2011.11.27

以上人瑞有 7 人之多<sup>4</sup>。

本鎮原住民人數約 550 人，族別以泰雅族為主。其餘約 90%左右的人口皆為客籍人士。

### (三) 經濟產業

#### 1、產業概說

產業目前仍以農業為主，耕地面積有 5749.21 公頃，佔總土地面積的 45.81%，但因本鎮多為丘陵和山地，大多為旱田，在農作物的生產上以稻米、茶葉、柑橘、仙草、香菇、蕃茄、草莓為主要的農產品。稻米種植面積二期作約為 410 公頃，因受限於本鎮的天然條件，稻農大多為自產自足。茶園種植面積約為 200 公頃左右，因氣候、地形等天然條件適宜茶樹的生長。因地屬丘陵地，年平均溫度為 22～23℃，目前栽種品種有海梨、柑椪、桶柑、茂谷柑，並以海梨柑為大量。仙草佔全台灣仙草產量 80%以上，為全台之最，是本鎮最具特色的作物。香菇於三、四十年前就開始以段木栽培種植香菇，所使用之段木樹種為相思樹、欒木、楓樹、杜英，不同的樹種種出的香菇香味也會有所不同。蕃茄主要分佈於台三線及一一八線之蕃茄農場，種植方式以水耕栽培法為主，位於台三線之蕃茄農場並引進世界各國三十多項蕃茄品種，為全國種植蕃茄品種最多的蕃茄農場。草莓主要分佈於縣道一一八線公路旁，種植面積約為 16 公頃，是全新竹縣最大的草莓產地<sup>5</sup>。將雜糧、蔬菜、果品、特用作物、花卉、苗圃、菇類作物一一臚列如下：

---

<sup>4</sup> 新竹縣關西鎮全球資訊網 [http://www.kuanhsi.gov.tw/kuanhsi\\_badge.asp?F1\\_id=004](http://www.kuanhsi.gov.tw/kuanhsi_badge.asp?F1_id=004) 參閱日期：2011.11.27

<sup>5</sup> 新竹縣關西鎮全球資訊網 [http://www.kuanhsi.gov.tw/kuanhsi\\_badge.asp?F1\\_id=005](http://www.kuanhsi.gov.tw/kuanhsi_badge.asp?F1_id=005) 參閱日期：2011.11.27

雜糧類	23.66				
	食用玉米：19.03	甘薯：3.40	落花生：1.23		
蔬菜類	131.25				
	其他：39.18	*竹筍：29.13	草莓：15.77	蘿蔔：7.92	大芥菜：7.36
	食用番茄：5.52	茭白筍：5.38	甘藍：4.17	薑：2.61	其他：1.70
	南瓜：1.59	蔥：1.48	青花菜：1.25	結球白菜：1.17	菠菜：1.12
	芹菜：1.08	不結球白菜：0.69	茼蒿：0.61	四季豆：0.53	花椰菜：0.50
	*韭菜：0.39	萵苣：0.37	香瓜：0.35	甜椒：0.35	蕓菜：0.30
	茄子：0.15	辣椒：0.15	芋：0.14	豌豆(荷蘭豆)：0.13	胡蘿蔔：0.11
	結頭菜：0.04	*金針菜：0.01			
果品類	685.09				
	*海梨柑：360.43	*檳榔：86.97	*桶柑：67.89	*茂谷柑：41.82	*椪柑：30.20
	*四季桔：20.01	*文旦柚：19.66	*香蕉：14.98	*紅龍果：13.44	*柳橙：10.87
	*柿：10.23	*梨：1.20	*栗：1.00	*李：0.90	*斗柚：0.81
	*枇杷：0.71	*龍眼：0.70	*桑：0.64	*楊桃：0.50	*橄欖：0.45
	*其他：0.42	*其他：0.30	*番荔枝：0.30	*木瓜：0.23	*楊梅：0.20
	*番石榴：0.12	*桃：0.10	*梅：0.01	*改良種芒果：0.00	*棗：0.00
特用作物	264.67				
	*茶：196.24	仙草：45.44	*油茶：18.58	*咖啡：4.13	其他：0.27
	洛神葵：0.01				
花卉	19.90				
	*其他：19.33	*蘭花：0.57			
苗圃	30.00				
	*苗圃：30.00				
香菇及其他菇類	450.00				
	*段木香菇：450.00				

表 1、關西鎮作物一覽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

備註：1．洋菇類、草菇單位為坪，太空包香菇、木耳、蠔菇、其他菇類單位為千包，段木香菇、白木耳單位為噸，金針菇單位為千瓶。2．其他作物單位為公頃。

## 2、茶產業簡史

同治初年，徐鴻保及邱友進有鑑於關西地區多屬丘陵地形，且土壤屬黃棕黏質土，排水性佳，故在開墾之初便引進茶葉試種，因試種的成效良好，因此在數年間便快速流傳於關西地區（邱瑞杰，1999），更有說法指出，劉銘傳修建鐵路至新竹，是爲了外銷茶葉的緣故（陳煥堂、林世煜，1999）。在日據初期，歐洲飲紅茶風氣盛行，當時印度茶爲大葉種，台灣屬小葉種，小葉種的優點在於烘焙出的茶較美觀，因此歐洲選擇台灣種的茶，台灣茶葉便趁勢而起。日本政府更趁機獎勵茶作，引進先進的揉捻機與機械鍋設備，並創設茶葉試驗所、茶葉傳習所、模範茶園、茶葉檢查所等（施翠峰，引自張琬如等，1999），使得茶產業日趨成熟，讓茶產業成爲關西地區最主要的產業。但今非昔比，全台單一鄉鎮市茶園面積最大的關西鎮（陳煥堂、林世煜，1999），因生產成本過高，在國際市場上不敵其他國家的低價競爭，茶園面積從極盛時期的四千多甲，一路衰退至兩百甲左右（民國九十九年）。即便如此，在新竹縣整體茶園面積下滑的情況下，關西鎮仍能在新竹縣佔有百分之四十的種植面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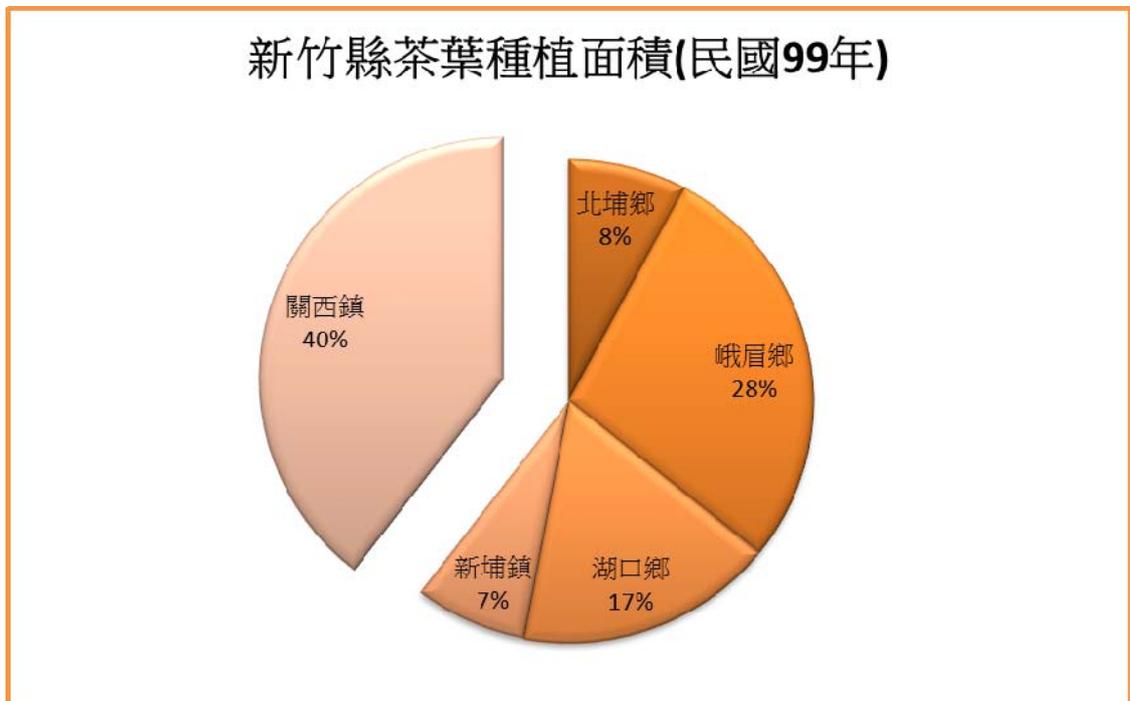


圖 5、新竹縣茶葉種植面積比較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

### 3、羅家與茶產業發展

欲瞭解關西地區的茶產業，就不得不提到羅家在此扮演的角色，這是因為羅家開設的台灣紅茶公司曾經名列全台灣十大貿易公司之一，而近年來轉型為觀光茶廠，與另一家也是羅家開設的錦泰茶廠，為關西鎮的兩個重要觀光茶廠。也就是說，從羅家發展茶產業的歷史，可以一窺關西茶產業的發展。

在昭和年間，羅家便開始經營茶廠，起初是收購其他茶工廠的粗製茶，而後轉為精製加以統合包裝外銷。1937 成立台灣紅茶公司，並組織各小廠，意即不再經由台北的茶販和洋行外銷，統一由台灣紅茶公司將茶葉直接外銷。當時主要的外銷市場為倫敦、紐約、荷蘭，每年紅茶總額約在兩千萬公斤（張琬如等，1999）。1938 年甚至獲台灣總督府頒發紅茶特等賞（圖六），並要求獻上紅茶給日本皇室<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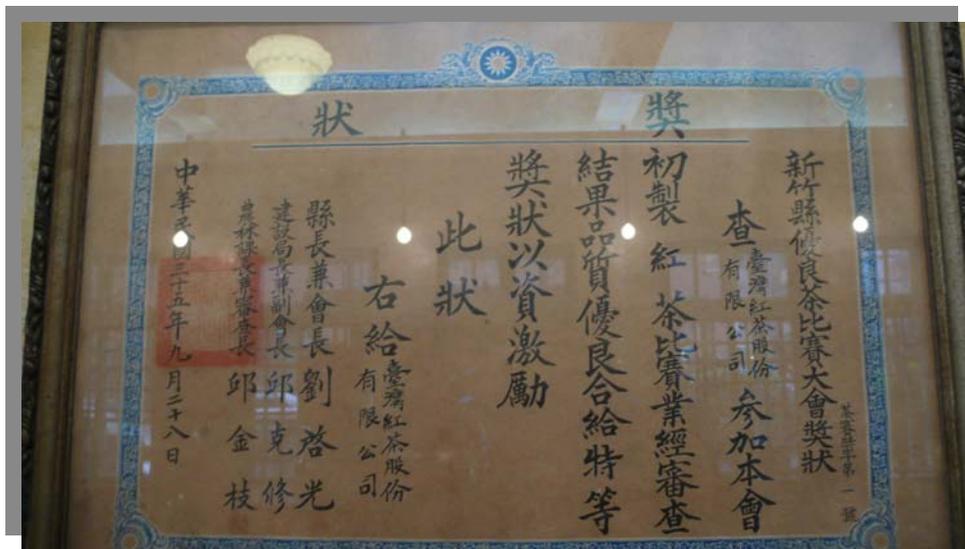


圖 6、台灣紅茶公司茶葉比賽優良獎狀

創立至 1941 年，是台灣紅茶公司的鼎盛時間，全關西有七十二家茶工廠，羅家便佔二分之一以上，與羅家合作的十九個茶葉粗製場，皆是統一由台灣紅茶公司統一精裝包裝後外銷。1939 年因規模逐漸擴大，便在香港與廣州成立分公司（張琬如等，1999）。

在 1961 至 1971 年間在世界幾個茶區的競爭，如斯里蘭卡、印度等，這些國家的工資低廉，相形之下，台灣的茶葉因生產成本相對較高，使得台灣外銷茶訂單大幅下滑，特別是台灣紅茶公司的主力產品—紅茶。台灣紅茶公司為求生存，於是轉做綠茶，這是因為此時期北非摩洛哥大量訂購台灣戰後新出品的綠茶（張

<sup>6</sup> 台灣紅茶公司 [http://company.formosablacktea.com.tw/2008/06/blog-post\\_16.html](http://company.formosablacktea.com.tw/2008/06/blog-post_16.html) 參閱日期：2011.11.28

琬如等，1999)。另外，在 1960 年代也率先引進日本煎茶的技術，並於 1970 年代將日本煎茶銷日，形成另一波的輝煌時期<sup>7</sup>。

近年來，在外銷市場萎縮的情況下，逐漸轉向內銷，但台灣的內銷市場不大，於是便在 2004 年設立台灣紅茶文物館（圖七），除了有文物史料外，從日據時代便留存下來的半磚造半木造茶廠（圖八）也可供一般民眾參觀<sup>8</sup>。另一個由羅家所設立的錦泰茶廠，也轉型走向觀光茶廠。



圖 7、台灣紅茶公司廠房外觀



圖 8、台灣紅茶公司文物展示館

<sup>7</sup> 台灣紅茶公司 [http://company.formosablacktea.com.tw/2008/06/blog-post\\_16.html](http://company.formosablacktea.com.tw/2008/06/blog-post_16.html) 參閱日期：2011.11.28

<sup>8</sup> 台灣紅茶公司 [http://company.formosablacktea.com.tw/2008/06/blog-post\\_8516.html](http://company.formosablacktea.com.tw/2008/06/blog-post_8516.html) 參閱日期：2011.11.28

## 九、研究發現

### (一) 關西茶葉的歷史與發展

台灣的茶產業起源甚早，但真正形成在代的產業則奠基於日本統治時代。根據地方人士 L1 先生指出：

「真正台灣有茶生產的時候已經很久了，從十七世紀就開始了……我們關西的紀錄從乾隆那時候開始就有的人拿茶，那個時候開始，起先開始可能北部，以前手工時代就是閩南族群在做，我們這邊很平沒有。」

而關西開始有大規模的茶產業出現是在日本統治時期，L1 先生指出：「我們關西也是一樣，日據以前很少很少，日本人最多就四千甲。」但 L1 先生也指出關西清末的時代就在做茶，但「那個不是說一個企業在經營……我們老一輩的講，以前也有唐山的茶販，唐山就是中國的茶販，偶爾會來關西看。」L1 先生回憶時說道，在 1872 年，根據他的紀錄，關西就有百戶，有一百多戶大家庭在做茶。他們做茶尚不是有工廠在企業化的生產。他說到：

「他就是你一百多戶人家在屋前屋後都有一點茶園，他們時間到了就會採茶，然後利用晚上農閒時間，他們就會揉一揉、烘乾，然後第二天拿到市場上賣材料，有茶販會來收購，交給他們就好了。晚上茶販要請年輕人運到大溪，大溪又運到淡水河邊，又到大稻埕。這個是以前手工時代。那時候是沒有什麼烏龍茶，那就是茶嘛，我們客家話就叫半頭青。」

依照上面的說法，關西在十九世紀下的時候，已有普遍種茶的情形，但茶業尚只是家庭的副業，而日後的大型製茶廠也尚未出現。農民在農閒時種茶換取現

金，也提供勞動機會給年輕人。關西當時生產出的茶葉僅限於原料與初步的加工，生產出「半頭青」後就藉由山路與河運至台北大稻埕在加工。半頭青只是茶葉加工過程中的半成品。

關西地處偏遠，由關西省產出的半成品運送至大溪乃至台北，必須由挑夫挑送。這個挑送的過程除了提供年輕人勞動機會賺取工資外，也形成故舊相傳的茶道，是關西特有的勞動與茶葉地景。L1 先生提到：

「我們的茶他們會來買，茶販會來……，一天關西可以收到一千斤左右的茶。收到就堆在一起，然後晚上要找挑夫，挑富大概一個人要挑一百零二斤，台斤。晚上要走十六公里，很遠啊。那個工資比一班的工資還要好，那個要年輕力壯才可以……所以到傍晚茶販那裏就很多年輕人會聚到那裡，」

而挑夫回程的時候也會在大溪購買本地所需的豆腐、魚乾、海產等等。在其他的訪談中，受訪者 L2 更補充這條挑茶的路線，由關西延伸至新竹的產區，北埔與峨眉。他說到：「我們台灣也有一個茶路，茶路怎樣講，早期我們關西地區老百姓自己做的茶，經過我剛才講的茶路，由北埔、峨眉到竹東，經過有一個古道，鹿寮坑那裡，那個道路都是石頭路……經過鳴皋古道，到桃園的石門三坑，三坑那時候是小集貨區，那有個小船，小船可以到大崙崁溪，大崙崁溪就是大溪。那時候水可以行船到艋舺、淡水。」所以當時峨眉、北埔、竹東、關西一帶的客家聚落生產的半成品「半頭青」都是農民農閒之餘小規模的生產，再藉由這條過去的茶路菁山路雨水路運送至艋舺、淡水再加工出口。

關西在清末，日據以前的地方製造生態大致如上所描述的小農生產，販售至台北再加工。再日本人統治台灣之後，日本開始對茶產業大力的扶植。根據 L1 先生的回憶：「日本拿到台灣後，他想發展茶業，因為日本是一個茶葉加工的老國家，他們的茶葉在 1860 年代已外銷到美洲與歐洲……台灣要發展紅茶，所以開始去找。日本大企業開始注重茶葉，就是三井。台灣茶葉一大功臣就是三井。它一

來台灣就在桃園那邊有一個苗圃，然後有一個工廠……」

至於 L1 先生家族是如何從事茶業，L1 先生家族經營茶業的歷史，可以見證關西乃至台灣茶葉的發展過程。根據 L1 先生的說法，因為 L1 先生的家族早先熱心公益，所以日本人願意把土地賣給他們：「所以我們跟他買六百多公頃，那個時候是我們真的開始做茶一個起步……到了 1937 年我們就做一個貿易公司，那個時候關西就有三十幾家。那時候關西人口三萬多一點，有三十幾家工廠。」在 1937 年時，關西的茶葉由日本人的開發已有三十多家工廠，而這也確定一班農民種茶，大工廠加工外銷的福特式生產方式，當時生產出來的已經不是半成品，而是可以直接販售，供應外銷的成品（圖九）。



圖 9、1937 年台灣紅茶公司出口盛況

關西在日據時代晚期已形成現代化的製茶工業，茶農以製作的方式生產茶業，在關西本地生產加工運送到海外銷售。當然清末的茶路已不再是茶業的運送路線了。

關西在 1930 年代末期已成為北台灣重要的茶葉產地與集散地。根據 L1 先生的紀錄，當時關西有四千頃的茶園，一年有兩百萬公斤的茶業，他們的路線已是經由路運，在基隆出口：「你那兩百萬，你透過大嵙崁溪，然後用水運，漂到那裡，不可能啦。」而茶業生產現代化的過程為什麼要成立貿易公司，以及產銷分離？

L1 先生解釋這麼大的產量，在技術、生產、包裝、進出口報價等，都需要現代化，所以必須進一步的分工。「真正茶業有分類，有那種規格、檢驗、外銷規格的，是日本時代才有的。」(L1)

關西的茶產業在日本統治時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其發展到了民國 70 年到高峰。但是在之後就開始轉變：「民國 72 年，台灣茶業的分水嶺，那一年開始因為外銷碰到很多壓力。農業單位開始推責任，就是外銷都是貿易商不好、工廠不好。茶農自產自銷的話就沒問題，就通通解決了，那個時候開始，工廠管理規則廢除。民國 72 年，在台灣就那一年開始，你做茶不需要 license，不需要工廠登記。只要你是茶農，你就可以做，你就可以賣，而且不用發票……現在做茶的有一萬多家，而且好就坐，不好就不做…你也沒有辦法追蹤這個茶。」(L1) 先生站在大廠家與貿易商的立場指出，在廢除工廠管理規則登記後，原有的生產體系被破壞，而小廠在缺乏知識與商業道德，特別是無法追蹤管理的情形下，所衍生的商品品質問題層出不窮。例如它就指出這種缺乏管理與無法追蹤的問題就造成茶葉外銷日本時因為少數廠商農藥使用違反規定，導致全台輸日的茶業都必須遭受更嚴格的管制而增加成本。他也曾提到，台灣過去茶業外銷的重要市場北非市場，因為退出聯合國而受到政治影響，一夜消失的例子。但北非摩洛哥消失的市場上可用日本市場來彌補，可是在取消工廠管理規則之後，卻導致了外銷茶葉品質參差不齊而倍感困難。在民國 70 年代起，台灣已由茶葉出口國改為茶業的進口國。

另一個造成關西茶園面積銳減的因素，由最多時 400 餘公頃至今 200 公頃左右，則是台灣內部的因素，L2 先生指出：

「外銷下滑，農民子弟的意願，繼續經營茶園的意願卻降低，再加上政府鼓勵造林，工商業發展，所以農民不願意務農，出現斷層……這些客觀因素造成我們今天關西區塊茶園的萎縮。不但如此，連芎林那些查廠都關門了。」

在關西的茶產業持續下滑的同時，原有的大茶廠與貿易公司也由原先全盛期

的三十餘家減少為個位數，小農們也轉型至有機茶園、課外教學以及休閒農場。在訪談中，大茶廠的 L1 先生主張，台灣的茶葉市場仍然要做到外銷導向，因為台灣有競爭的優勢：「台灣要做什麼茶，竟是要外銷導向.....我們自己做最有特色的。我們全世界我們最可以競爭的就是綠茶粉。」

就關西地區何以沒有北埔峨眉等地特產的膨風茶，主要的原因與關西工業化的生產方式相同。例如 L2 先生提到：「六月芒種季節，小葉綠蟬繁殖厲害，它有叮咬過茶葉，茶葉會萎縮，會有病的茶園，叫做生病的茶園。這個茶園採的茶一般工廠不收。.....叮咬過的茶葉會變成棕褐的顏色、病態的顏色，又不是很旺盛，不向一般綠油油的旺盛。」就農民而言，遭到蟲害的茶葉賣不出去很可惜，僅在餘暇的時候少量的做。L2 先生特別指出：「我們工廠比較少做，因為做大量的已經來不及了。」我們可以由此理解在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之下（圖十及圖十一），由機器大量摘採的茶葉，縱有部分是可以生產膨風茶的茶葉，但稀釋在一次數萬斤的茶葉原料中，也難生成出特有的香味。另外，大量遭受蟲咬的茶園，因為葉片會萎縮病態，同時色澤亦不好看，在重量與外形、顏色等條件節不符合要求的情形下，也成為生病的茶原料，不會生產。L1 先生同時指出，關西大量生產下對茶葉的要求與限制：

「關西工廠很大，你一天只給他做一、二百斤，它根本成本不夠，像我們工廠一天可以處理一萬公斤左右，你沒有茶青五千公斤以上，我們工廠不能動.....每一個工廠都有一個經營規模，你經營規模小，所以我們一天那個 profit point 的折損點就是 6000 公斤。6000 公斤以下的成本會比較高.....膨風茶那個蟲會把水分抽掉，那個芽就會萎縮，雖然沒影掉下來，但它會有水分缺少的狀態，像採好的茶萎凋一樣，就是天然萎凋.....所以是可遇不可求，你刻意要重也種不起來。」



圖 10、圖 11、一貫化作業系統

根據上述的兩個現存大廠的觀點，關西的茶葉發展過程在經歷家庭生產到企業生產，到轉型多元化等階段，已走向少量多樣的生產方式。甚至連之前的大廠家也轉型生產少量多元的產品。例如 L2 的廠商就開發出柚子茶與炭焙茶等新商品。目前僅 L1 先生的工廠尚維持大廠營運的規模，與農民契作生產煎茶。L1 先生的工廠製作日式的蕪菁綠茶，每次至少要 500 公斤的茶青才可以生產，他說到：「尤其我們現在做煎茶，燒那個蒸氣部分要一、兩個鐘頭，只有一千斤的茶葉，我們根本划不來。」在關西，目前能夠維持如此規模的，可能僅存一家了。

## （二）多元化與轉型

前面述說了關西過去大茶廠的茶業發展歷程與各階段性的狀況，爲了應付市場的強烈競爭，目前關西茶產業已逐漸轉向小農生產與多元化經營。以下將探討目前小型農戶的應對轉型方式。

根據茶葉產銷班的 F1 先生的說法，關西茶葉業生產品種的變化，過去以原生種植黃甘種爲主。之後轉變爲以青心大有爲大宗，夾有金萱品種，但量相較來說較青心大有少。約在民國七十年代，因改良場研發台茶十二號新品種並進行推廣，關西地方逐漸改種台茶十二號品種。

關西地區製茶種類多隨市場喜好有所變化。大致來說生產的茶種類包含紅茶、綠茶爲大宗，亦有包種茶、烏龍。膨風茶過去幾乎是沒有，就如同上一部分所提，茶農傾向不生產這類茶葉。即便如此目前關西茶農也幾乎沒有生產膨風茶，量非常非常少。膨風茶在生產過程中，產量相對較低，在透過茶葉比賽的炒作，在茶葉市場中其實會有較好的價格，比方 2011 年新竹縣東方美人茶比賽中，北埔生產的膨風茶獲得特等獎，價錢飆至每斤 12 萬元的天價。

膨風茶這個高的價格，對照關西茶區的情形，茶農並不會刻意生產膨風茶來競爭，而是傾向銷售茶青薄利多銷，或製成其他茶葉。這反映了關西地區茶農進行茶葉在商品化的過程，地方條件帶來了限制與障礙。從成本方面來說，首先可製成膨風茶的茶青原料價錢日漸飆高，每公頃茶園包給人採約要三、四萬。其次，膨風茶的茶青需要受小葉綠蟬咬嚙，因此必須以手採，因此所人力極高，人事成本驚人。若各農戶皆生產膨風茶，將出現包茶青、搶人工的現象。

關西地區每戶茶農所擁有茶園面積一般都不是很大，大約一兩公頃。就如前述所言，早期地方茶農多以銷售茶青給大盤公司製茶或外銷爲主，到了民國七十年代以後，外銷市場逐漸萎縮，茶葉銷售從外銷轉型爲內銷，茶農慢慢轉型自己製茶。即便如此，因爲內銷市場口味的以高山茶爲主流，關西生產的茶葉在市場上便失去優勢，勢必要尋找新的通路或改變生產策略。根據地方訪談內容，地方

小戶茶農面臨這樣的限制與困境，在思考如何將茶葉再商品化的經營中，大致有三個類型的因應。

第一個類型是傳統茶農，並不特別進行策略經營，採取傳統茶農生產的心態，根據與受訪茶農 F1 的對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問：所以當時我們在家裡面賣嗎？還是挑到市場上去賣？

F1：我們都是在家裡，沒有挑到什麼……除非有什麼改良場，還是農會有什麼展示的這樣，我們才有辦活動才到外面去賣，有辦活動就到外面去賣啦，沒有辦活動我們就在家裡。

問：那沒有賣到關西的街上、竹北、新竹這些地方去？

F1：賣是我們親戚朋友是有啦，可是我們沒有到那些去賣，是這樣啦！

在生產銷售過程中，去過大茶廠一次大量購買茶青或半成品的模式不復存在，對茶農來說，會擔心生產的茶葉滯銷或賣不出去，因此迴避高風險的經營手法，不特別主動去開闢新的通路。主要承襲過去祖父輩以的營銷方式，讓人包茶園或是盡快將生產的茶葉茶乾銷售。其次就是茶農已無能力去轉變他的產銷方式，如本研究受訪的一位茶農所言：「家裡面有只有我自己在做茶葉。太太有幫忙做……年輕的就他幫忙也有啦，不是常常的，有時候不去的時候，叫他幫忙他也會幫忙……年輕人現在他也不要學了啦。」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之下，必須雇請人力，家中年輕一輩有自己的工作，也只是臨時幫忙茶園事務。從這段敘述來看，茶農的心態顯得較為消極，也比較不願意去生產較費時費工的茶葉種類，比方膨風茶。

研究區內觀察到第二類型是轉型有機，跳脫了茶葉比賽的價值定義體制，從另外一套價值體系來論述茶葉，用另一種生產路數來製造茶葉，透過這樣的方法尋求市場利基與優勢，在這個部分受訪的茶農 W1 先生的則有這樣的說法：

「.....做這麼久有機茶之後，到現在會覺得客人對於茶的好壞很難講，尤其做有機茶啦或是做綠茶到這個時候大部分都是以健康為訴求，然後為什麼要喝綠茶，綠茶不好喝啊也不會香啊，泡起來又淡淡的.....為什麼要喝，現在就是注重他營養，那喝綠茶的人就是為了健康啊，但是健康而喝又怕農藥，現在人啊又怕化學又怕什麼汙染啊.....」

同時有機茶在通路方面，重視通路的開展，展售會、網路銷售、手工製茶等等，比方 W1 先生的茶園除了生產茶葉、製造茶葉之外，亦同時提供啜為戶外教學的場所，提供與客人面對面的機會，告訴客人雖然這些茶的口味不好，但卻是值得購買。當茶農不走茶比賽的這條路，透過講求健康、營養的面向來回應一般茶比賽要求的口味、喉韻、茶色等等價值辨識的評斷標準，茶農與消費者兩者的共識，便是透過這樣的管道來進行協調。

而在生產鍊這個面向思考有機茶，則是反應了在這個背後成本與供給上面的市場機制，W1 先生提到：「有機就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啊，這個東西市場又不是很大，又不能很大力的去推廣，你大力推廣大家去做，.....你大力推廣到現在慢慢是不是問題出來啦，成本一直增加工資增加，沒有工啊，這個狀況沒有要怎麼解決，就都跑去大陸啦，大陸做就進來啦，最後得到好處的不是人民啊，農民還是犧牲者」。就茶農來說，有機茶尚屬小眾市場，而且是不利於規模經濟的一種生產方式，生產規模化反應的則是不斷膨脹的人事成本，所造成的結果則可能是外來茶業的進入與品質管理的問題。

有機農法相當重視田間治理，在有機茶的生產過程中，高成本顯然是個主要限制。同時，相較於慣行農法的茶葉，有機茶的產量會低很多。因此若要提高生產規模，擴大面積或增加產量，首先面對的是高成本的負擔。田野訪談中，受訪

個案所顯示的實際情況，田間管理、採茶、製茶所需人工都成爲發展或進一步擴大的阻礙：「...現在主要是有時量會不足，最主要就是採茶工啦或是茶園管理工啊那些，不見得請的到人，請的到成本都很高...」。受訪的 W1 先生農場何以一直難以擴張它的規模，其原因就在於有機茶的生產屬性，產量的不穩定與人事成本高，致使它必須負擔高的風險，這對小農來說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研究區內觀察到第三類型是多元化經營，透過主、副業的兼營，加上各種副產品的生產，擴大市場上的利基。在田野訪談中 F2 茶農的農場中，除了產茶、製茶、賣茶之外，更兼營多種果樹，例如楊梅、樹葡萄。其他還有種類繁多的加工品，像是山苦瓜酵素、楊梅汁、蜜餞、茶葉瓜子等等，同時也經營休閒農場，提供旅客參觀、教學的場所。甚至也生產膨風茶，這在關西地區算是非常少見的。根據 F2 先生的說法：「其實作（膨風茶）很辛苦啦，請那個三四年級的小姐也很難請啦……像小姐（指採茶工）我都不鼓勵他做這個行業啊，你就認真讀書，軍公教做警察，時間到這樣坐著就有錢，我們這都三更半夜啊，沒好天氣不能做，好天氣都曬死人，如果退休下來都消遣那可以，如果像我們當職業不行……」這段敘述反應了地方茶農的心態，即便農場中開發了各種各樣的產品，但每種產品卻無法達到生產的專業化或高品質化，而是透過轉型爲多角化經營搶占市場。

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因素在於茶農所擁有地茶園面積小、產量少，無法達到過去那樣的茶青生產量，加以關西地區大茶廠紛紛關閉，整個關西茶農的生產模式進行轉變：「現在（茶葉）越來越難做啊，你不轉型不行，單單靠一樣不行，維持不下去，像我兩夫婦都沒有跟人家上班啊，單單靠賣茶葉，當然你做批發可以啊，可是以前你如果做茶炒的話，你今天炒好，明天早上就有客人來啊，那問題你問題越來越難做，沒有客人你怎麼辦，你要做好，量少一點放著慢慢賣，沒有像以前批發的話人家就三百五百斤頂多一千斤這樣，那你現在沒有啊，品質做好做少量一點價格賣高一點，就這樣而已啊，單單靠一樣又不行啊」（F2）。

茶農 F2 先生的例子說明了地方小農面對生產上因規模小所帶來的產量、通路的限制，而採取的折衷辦法，並不是追求量大的薄利多銷，也不是單一茶葉生產的高品質追求，而是選擇生產的多樣化，這算是關西地區茶農發展的另一種模式。

## 十、結論

關西過去是台灣最大的茶葉產區，有著相當輝煌的歷史。然而隨著時間推進，茶園面積的銳減，茶產業的生產方式也紛紛發生轉變，產茶製茶也並非目前關西地區茶農唯一的主業。本研究討論關西茶產業的歷史發展變遷與轉型再發展，對照過去大型茶葉公司與地方小農的經營方式，了解近百年來的發展歷程中，關西茶產業面臨了何種發展限制與尋出路。

在動態的地方產業發展過程中，茶葉的再商品化，意味著舊有的商品逐漸失去優勢，這與產區內部條件及大環境社會的外部因素息息相關。對關西茶葉來說，外銷市場的萎縮無疑是一大衝擊，產區優勢不復存在，並引起後續的一連串效應，使得茶園面積逐漸減少，地方勞動力外溢到其他部門產業，迫使地訪茶農不得不改變經營策略，比方經營有機茶葉、產區多元化經營，或甚至維持舊有小農經營模式。

因此，本研究在進行田野調查資料與理論文獻相互對應之後，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 一、 關西地區過去是台灣主要生產茶青原料或半成品之產區，茶農與茶廠形成原料與加工的分工，再由貿易商或盤商出口，形成一種福特主義式的生產方式，大規模的生產降低生產成本，也成為本區茶業生產的優勢。
- 二、 民國 70 年代以後，茶業生產制度的改變，廢除工廠管理規則登記致使台灣地區茶葉生產提供外銷產品品質變得不穩定，衝擊到外銷市場，並波及到地方茶葉工廠的經營，使得關西地區茶業生產面臨轉型的危機。

三、目前關西茶業不論是生產的產量亦或農戶數，與昔日相較皆不可同日而語。產區的凋零與今日型態轉變說明了地方茶業優勢的喪失，以及近三十年來茶農尋求發展轉型與再商品化過程。

四、本區茶業較為特殊的一點，較不從茶比賽機制定位自身茶葉的價值。對於農民而言，參加比賽一個學習市場口感的場合，同時也是目前市場唯一資訊的定位者。然而對於本區的茶農來說，生產比賽茶代表的是一種高成本、高人工的生產方式，對於關西茶區來說，整體的生產結構或生產模式較無法配合這類型的茶葉生產，因此地方茶農要大打有機的招牌，自行論述茶葉價值，要不就採多元化生產加工副產品，尋求寬廣的市場利基。在茶比賽中較無特殊的表現。

從本研究的例子來說，茶葉作為關西地區重要的農產品，產區制度的建構，應與地方文化、社會與歷史發展的特色相互配合。政府應理解地方發展狀況，達到地方資訊、技術與政策上整合的執行與把關。

## 十一、參考文獻

- Appadurai, Arjun (1986)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Appadurai, Arjun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ppadurai, Arjun (2006) The thing itself, *Public Culture*, 18: 15-21.
- Boyer, R. (1990)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95-120.
- Coe, N.M., Kelly, P. F., Yeung, H. W. C.(2007) *Economic Geography: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 Davies, Anna R,(2002) “Power, politics and networks : shaping partnerships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 *Area*, 34.2: 190-203.
- Freidberg, S. E. (2003) Cultures, conventions and colonial constructs of rurality in south-north horticultural trad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7-109.
- Gereffi, G. (1994) Capitalism,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ommodity chain. In Sklair, L. (ed.)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Goodman, D. (2003) Editorial — the quality “turn” and alternative food practices: reflections and agend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1-7.
- Goodwin, M.(2006)Regulating rurality? Rural studies a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In: Paul, C. et al. (ed.)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p.304-316.
- Harvey, D. (1982)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all.
- Healey, Michael J. and Ilbery, Brian W.(1990) *Location & Change*.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nson, S. (2000) The process of food quality belief formation from a consumer perspective. In: Becker, T. (ed.) *Quality Policy and Consumer Behaviour in the European Union*. Kiel: University of Kiel, pp.45-62.
- Jarmo Kortelainen (1999) ,The river as an actor-network:the finnish forest industry utilization of lake and river systems,*Geoforum* 30(1999)P.235-247
- Jessop, B. (1997) Twenty years of the (Parisian) regulation approach: the paradox of success and failure at home and abroad, *New Political Economy*, 2: 503-26.
- Lewis, N., Moran, W., Perrier-Cornet, P. and Barker, J. (2002) Territoriality, enterprise and regulation in industrial governance,*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 433-62.
- Little, J. (2001) *New rural governan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5 (1): 97-102. London: Routledge.
- Marsden, T. (1992) Exploring a rural sociology for the Fordist transition; incorporating social relations into economic restructuring, *Sociologia Ruralis*, 32: 209-31.
- Marsden, T. (1998) Economic perspectives. In: Ilbery, B. (ed.) *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 Longman: London, pp. 13-30.
- Moran, W.(1993)Rural space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tical Geography*, 12(3): 263-77.
- Murdoch, J. (2000) Networks – 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6: 407-419.
- Murdoch, J. (2006) *Post-structuralist Geography*, Sage: London.
- Murdoch, J. and Miele, M. (1999) “Back to nature” : changing ‘worlds of production’ in the food sector. *Sociologia Ruralis*, Vol. 39, No. 4: 465-483.
- Murdoch, J., Abram, S. and Marsden, T. (2000)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for housing: ‘playing the numbers game’ .In: Stoker, G. (ed.) *Power and Participation: the New Politics of Local Governance*, Macmillan, London, pp.108-34.
- Murdoch, J., Lowe, P., Ward, N., and Marsden, T. (2003) *The differentiated Countryside*, London: Routledge.

- Murdoch, Jonathan ,Terry, Marsden and Banks, Jo (2000) “Quality, Nature, and Embeddedness :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od Sector” ,Eco.Geo,76(2).
- Murdoch, Jonathan, (2000) Networks-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6: 407-419.
- Neilson, J. ( 2007 ) institutions, the governance of quality and on-farm value retention for Indonesian specialty coffe,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28: 188-204.
- Panelli, R.( 2006 ) Rural society, In: Paul, C. et al.( ed. )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p.64-90.
- Parrott, N., Wilson, N. and Murdoch, J. (2002) Spatializing quality: regional protection and the alternative geography of food,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9 (3): 241-261.
- Peter, Dicken, Philip F.kelly, Kris olds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 Chains and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scales: towards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global economy, Global Networks1,2(2001) P.89-112.
- Putnam, Robert D, ( 1993a )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 1993b )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 35-42.
- Putnam, Robert D, ( 1995 ) “Tuning in, Tuning out :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n, ”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4, 664-683
- Raikes, P., Jenson, M. F. and Ponte, S. (2000) Global commodity chain analysis and the Franch filiere approach: comparison and critique, Economy and Society, 29: 390-417.
- Renard M-C( 2005 )Quality certification, regulation and power in fair trad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1 ( 4 ) : 419-31.
- Rydin, Yvonne and Pennington, Mark ( 2000 )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 planning :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and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capital. *Local Environmental*, Vol. 5, No.2, 153-169.
- Sauer, M. ( 1990 ) ‘Fordist modernisation of German agri-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family famrs’ , *Sociologia Ruralis*, 30: 260-279.
- Simmel, G. (1957) Fash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XII (6): 541-88.
- Stan B-H Tan,(2000) “Coffee frontiers in the Central Highlands of Vietnam : networks of connectivity” ,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41,No.1: 51-67.
- Storper, M. and Salais, R. (1997) *Worlds of Produ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torper, Michael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 Storper, Michael (2004) Society, commun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Elsinore, Denmark, June, 14-16, 2004.
- Thevenot, L., Moody, M. and Lafaye, C. (2000) Forms of valuing nature: arguments and modes of justification in French a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 disputes. In: Lamont, M. and Thevenot, L. (eds.) *Rethinking Comparative Cultural Sociology: Repertoires of Evaluation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98-326.
- Thrift, N.(2008)*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 space, politics, affect*.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 Woods, M ( 2005 ) *Rural geography*. London: Sage.
- Woods, M ( 2010 ) Performing rurality and practicing rural geography. *Progress Humsn Geography*, 34(6): 835-846.
- Woolcock, Michael, ( 1998 ) “Social Capt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 151-208.
- Winter, M. (2003) Embeddedness, the new food economy and defensive localism. *Rural*

studies, vol. 19: 23-32.

楊美峰（2008）新竹縣關西地區茶產業變遷與轉化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與政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李明賢（1999）咸菜甕鄉街的空間演變，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邱瑞杰（1999）清末關西地區散村的安全與防禦，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林滿紅（1999）台灣商業經營的中國傳承與蛻變－以近四十年台灣相關研究為基礎之省察。見黃富三、翁家茵主編，台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 1-44。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林滿紅（1975）茶、糖、樟腦與晚清台灣經濟社會之變遷 1860-1895，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張琬如、王曉薇、黃志賢（1999）關西上南片羅姓村的形成與發展，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陳煥堂、林世煜（2001）台灣茶，台北，貓頭鷹。

黃國憲總編輯（2000）關西鎮誌（稿本）。

梁炳琨（2008）農業食物在地化：臺東縣池上鄉米食產業的探討，地理學報，53：85-117。

梁炳琨（2008）農業食物在地化：臺東縣池上鄉米食產業的探討，地理學報，53：85-117。

譚鴻仁（2007）關係空間與鄉村發展：以龍潭膨風茶產業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系地理學報，50:47-72。(TSSCI)

譚鴻仁（2009）膨風茶的地理學，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台灣紅茶公司 <http://www.formosablacktea.com.tw/>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

新竹縣關西鎮全球資訊網 <http://www.kuanhsi.gov.tw/index.asp>